

中国戏剧出版社

洪深文集

1

中国戏剧出版社

洪深文集

1

洪深文集（一）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33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125 插页6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平）7,001—8,500册 （精）2,901—3,400册

ISBN7-104-00025-9/I·9 定价（平）3.40元（精）4.50元

重 印 说 明

洪深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家。他的著作，对我国的戏剧和电影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且至今受到国内外文艺界、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最近几年，许多单位和读者都提出要求，希望继续出版洪深同志的各类著作。

现在我们印出的《洪深文集》第一至四卷，是在洪深同志去世后不久编辑出版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对洪深同志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也发现了一些新材料。现决定重印发行第一至四卷，并着手编辑第五卷，作为补遗。

这次，除将第四卷中《现代戏剧导论》一文作了重排，补齐了原先被删节的部分之外，均按原型重印。

中国戏剧家协会

1987年3月

编 辑 说 明

本文集收辑洪深同志一生有关戏剧方面的主要著作，计
分四卷。第一、二卷收辑话剧剧作，第三、四卷收辑戏剧理论
和电影方面的著作，都是按照写作年代编次的。洪深同志早
期的一些作品，因为原稿散失，未能选入，我们深感遗憾。

本文集的全部作品，在这次编印时，都曾根据收集到的
初版本或其它版本进行校勘，并增加了一些必要的简注。

我们的收辑、编选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适当和不细致的
地方，希望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指正。

中国戏剧家协会

1957年6月

第一卷说明

本卷收入洪深同志从1916年到1932年这一时期的六个剧本。

《贫民惨剧》作于1916年。

《赵阎王》作于1922年。

《少奶奶的扇子》作于1923年，系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著《温得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

《五奎桥》（《农村三部曲》之一）作于1930年。

《香稻米》（《农村三部曲》之二）作于1931年。

《青龙潭》（《农村三部曲》之三）作于1932年。

原本中的序言、后记和论文作为附录依次编入本卷。

中国戏剧家协会

1957年6月

憶洪深兄

——代 序——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午后，因为将要到华南旅行，我正在赶写一篇文章，并結束一下机关的工作，忽然接到对外文化联络局的电话，說洪深先生找我和阳翰笙、夏衍两同志去談談。知道深兄病况轉坏，我心里很紧张，因一时找不到阳、夏两兄，我去铁狮子胡同邀了欧阳予倩同志赶到什景花园小細管胡同十号，深兄正睡在客堂里的藤床上，洪师母也在側，女护士正安排給他打止痛針。

洪先生見我們来了很兴奋。我問起見邀的原因，他說他的病可能不起，他的夫人在北影洗印厂服务得很勤慎，有“模范工作者”之称，他很放心，所不放心的的是他的女儿——洪鋼、洪銅。她們在学校里成績都很好，只是年紀还小，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还需要照顧的，他特別希望我在政治上給她們以帮助，使她們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我答应了。我劝他对于他的病不要过于紧张。大夫既証明不是癌（这当然是安慰他的），而是一般的肺病，以他的体質，以今天北京的医疗条件，是完全有办法的。“治病也是一場激烈的斗争，我們精神上不要先被击败了。”我說。我还笑着提起他早年几次誇大他的病况，說医生宣告过他的胃病严

重，只能再活两年，而他只剩一年好活了，但后来他又活了好些个两年，胃病也终于好了。又談起一九三七年他領着救亡演劇二隊由南京渡江到徐州、鄭州一帶戰區工作，那時戰局緊張，到戰地工作，隨時有發生危險的可能。因此，他曾緊緊握住我的手說：“壽昌，再見。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分手了，愿你保重”。這種悲壯的台詞還留在我的耳朵里，可是不到三個月我們又在武漢見面了。深兄想起當日的情况也愉快地笑了。

洪先生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但也是一個挺理智、挺客觀的人，他又有極豐富的科學常識，明白自己病體的嚴重情况，指着架子上的書對我說：“這些書有些送給子倩，有些送給你”。我听了十分黯然。子倩笑着說：“你姑妄言之吧。”

護士要開始打針，他催我們走，我們就老实地回来了。后来我真是失悔，沒有趁這個時候多跟他談一些重要的藝術思想上的問題，也沒有能幫助他解決他要求已久的組織問題，這對我們、對他自己都是很大的損失。

隔了一兩天，洪先生病體更重，就從他家里搬到蘇聯紅十字醫院去了。我在他入院的第二天，在崇文門大街買了幾鉢鮮花去看他。那天他精神還好，很快地便走出病房，親給洪師母打電話。這一天我原想接觸一些問題的，洪先生談起前一天他兄弟來看他的事，似乎有些激動，我就沒講下去了。

第三天我匆匆陪阿爾巴尼亞文化代表團乘飛機到廣州去了，沒有再去看他。據說他曾向安娥問起过我：“壽昌什麼時候轉來？”安娥說：“可能在半個月後。”他就不作聲了。

到廣州的第三天，我陪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在愛群飯店樓

下餐厅进餐，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丁波同志交给我一封張光年同志发来的急电。深兄逝世了！才离开他一两天，我跟他真是永不能见面了，我哭了。

我把洪深兄的生平和他的死给我们大家的损失告诉阿尔巴尼亚朋友们，他们有的也认识他，都跟我们一样的震悼！

曾经想写文章、写诗哭洪深兄，但一直没有能写；曾经领戏剧界代表们，也曾陪洪师母去扫过他的墓，但这还远远不能表达我的哀感。

去年八月二十九日我在上海大舞台向一千五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做报告，当我告诉他们那天正是洪先生逝世周年忌的时候，全场都起立为洪先生默哀。洪深兄早期的戏剧活动主要是在上海，上海人民对洪先生是特别熟悉的、亲密的。他们对洪先生的死感到分外的损失和悲痛是很自然的。

洪深兄在上海的活动中政治性最强的一次应该是为罗克的《不怕死》（《上海快车》）而大闹大光明影戏院的事件了。罗克这部片子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侮辱中国人民，洪先生看了这部片子之后非常愤慨，他到日晖里四十一号南国社来找我商量，说他安排去影院讲话，要观众不要看。他估计：这样一定会引起影院外国经理和巡捕房的干涉。但他已经跟明星公司的律师谈过了，一旦被捕，请他出庭辩护。洪先生只是感到一个人去闹，势力单薄，出了事没人报信。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一行动计划，找了几位社员同志跟洪先生去，顺便助他的威，那是音乐家张曙，电影名演员金德麟（金焰）和青年记者廖沫沙（今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长）三位。在《不怕死》开映到出现侮辱华人的场面的时候，洪先生站起来了，他对观众开

始激昂地演說，鼓動觀眾的民族義憤，許多人喊“退票！”，“我們不要看！”以及“打倒帝國主義侮辱中國人的影片！”等等。洋經理果然馬上來干涉了，把洪先生扭到經理室，張曙、金德麟、廖沫沙等同志也跟着進去，一面保護洪先生，一面反對洋經理。金德、張曙同志是有些氣力的，廖沫沙同志氣力雖小，鬥志卻強，在洋經理扭打洪先生的時候，他們也狠狠地回击洋經理，廖沫沙同志說他在洋經理腿上打了好幾拳。洋經理本來是要找工部局拘押洪先生的，但在憤怒群眾的壓力下，怕影響大光明今后的營業，終於把洪先生釋放了。

在“八·一三”抗戰開始，上海組織戲劇界救亡演劇隊的時候，洪先生出了很大的力。救亡演劇二隊在長江南北岸活動中，洪先生又是團長，又是編劇，又是演員，不顧勞瘁，展開抗戰宣傳；在武漢軍委政治部三廳，洪先生又在黨的領導下參加組織訓練十個抗敵演劇隊，留下了深入抗戰宣傳，培養革命文藝幹部的巨大實際影響；在長沙大火前夜洪先生秉承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負責安排三廳工作人員的撤退，保護進步力量。及至我們由衡陽折回長沙救火，以火後的湖南財政廳舊址做根據地，洪先生協助黨指揮幾個抗敵演劇隊和其他進步文藝工作力量，投入對數十萬市民的救災運動，不只是發放千百萬元賑款被譽為空前廉潔和有效，而且在體會領導精神、吸取群眾智慧、加強準備措施的基礎上使集合在四五十個廣場中的數十萬市民群眾安然領到賑款，沒有發生什麼重大事故、遭受什麼損失。在這些地方，洪先生發揮了巨大的組織才能和行政才能。

也不能忘記我們在桂林的一些動人的場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留香港的進步文化人紛紛進入內地，首先集合在桂

林。我根据归国同志的材料和观感写成了《再会吧，香港》，由洪先生导演，已经取得许可证，就要开演了。国民党中央特务通过邱昌渭的手临时禁止了这个戏。洪先生和欧阳予倩兄多方设法进行了挽救，但是没有效果。于是洪先生决心进行揭露反动派面目的斗争。他在演出一场之后在临场伪军警的监视下走到幕外，对观众说明戏被禁止的原委，他举起许可证对大家说：“同志们，《再会吧，香港》只不过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和要求坚持抗战，坚持民主。这样的戏是应该被许可的，政府也许可了，这是政府对这个戏的许可证！新中国剧社这个穷团体为了演出这个戏投下了所有的人力物力，现在忽然又坚决不让演了，人力物力都白费了。但是我们得服从政府，以下几幕戏只好停下来了。感谢观众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信任，有的票子还是预售的，现在钱已经设法准备好了，请同志们有秩序地退票吧。”

洪先生说得那样沉痛而有节制，观众们怀着义愤和同情出场，绝大部分的人把票子都撕碎了，以不退票表示抗议。

这种地方最能看出洪深兄的面目。

在一九二八年南国社受欧阳予倩同志主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的邀请到广州公演的时候，深兄和我同住在观音山寓所楼上，我们有抵足谈心的机会。至今还不能忘记的是他谈起在美国改学戏剧的思想经过。他由清华留美，最初是学陶磁科的。他也有些干才，原想归国之后在实业方面有所施展，就是说想做一个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员闯将吧。他后来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家有联系，担任过该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回国后也任过公司的秘书，就具体说明他这一条思想线索。

辛亥革命后，时局仍然很混乱，洪深兄有感于国事螭蟾，他只身在海外曾經好一些时候不能睡觉。一来他的精神痛苦无法寄托，二来感到还在半觉醒状态的祖国人民需要通过最容易接近的戏剧艺术加以振作启发，这样他就舍弃陶磁专家的梦想，做了名戏剧家倍克教授的学生。

回国之后，他一面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一面独立成立剧社，演出受奥尼尔的影响、但主要暴露軍閥混战恶果的《赵閻王》。

我跟洪深兄正是在这时候通过欧阳予倩同志的介紹認識的。他也同样以予倩的介紹参加应云卫兄等的戏剧协社，导演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奠定了中国話剧表导演艺术方面初步的規模，《第二梦》以后，洪先生退出戏剧协社参加了南国社，成为我們的領導力量，在我們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曾經有計劃地給了我們一些物質支持。是他給了我們的事業以极大的鼓励。

由于洪深先生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受他的影响的学生在他的领导下組織了复旦剧社。在这个著名的学校剧社里，他也不只是导演、顧問，而且是演員，他曾亲自演过洛斯丹的《西哈諾》。

洪先生对艺术創造是十分严肃的，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最沒有架子的演員，中国老戏界有一句話叫“救場如救火”，在急迫的需要前面他正是一位披髮纓冠，不顧一切的“救火員”。南国社从广州公演回来，失去了它一些主要演員，当它重整陣容在上海宁波同乡会演出时，又遭受了自由主义者的进攻。已經是开戏的前两个小时了，《南归》的主要演員

忽然以某些口实不来了，戏无法演出，但又不能退票。洪先生知道了，竟毅然接受了这个剧本，扮上了。許多台詞他不熟，在几位提詞者的帮助下，靠着多年的舞台經驗，居然把这个抒情的小戏对付下来了。当人們称美他的勇气的时候，他說：“这样的急就章是不足为訓的，但演員事前不宣布理由，擅自不到，也不找代理人，是对戏剧运动的謀害行为，更不足为訓，我这样拚着我的艺术生命上去，只是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抗議。”

洪先生平日生活得有条理、有計劃。对做学問，对教学工作如同他对艺术工作一样是十分認真負責的。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我在江湾复旦大学他的家里住过一些日子。我每天起床不算晚，但洪先生每天通常是五点钟就起来了。他看書爱用打字机做細致的記錄，做文章和講演的提綱也常用打字机，每天黑早和深夜都可以听得到从他書斋透出的噠噠的声音。

他爱人民，爱朋友，也爱妻子、儿女。但当皖南事变前后抗战形势逆轉，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共产党进攻，摧残进步力量的时候，洪先生无限悲憤，曾服用大量安眠药，企图举家自杀。幸而发觉得早，洪先生和他的家人被救轉来了。这次事件曾引起南洋各地人士的关心，紛紛来信慰問他。由于我們的亲密关系，当时还有人誤傳是我的事。

在解放后，他一直为党为人民工作得那样积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率領文化代表团到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去簽訂文化协定。在波兰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有肺癌，电告我国政府，次年二月党就讓洪先生回国了。他回国的时候，正当人

大召开之前，洪先生还扶着病到无錫、常州一带視察农村。后来他的病情逐漸严重，癌細胞发展，严重压迫到神經，痛苦非常人所堪，不了解他的人憂慮他自杀，但洪先生不，他对他的夫人說“我要向病魔斗争，还要看到黄河水清，我还要爭取入党。”的确，他在病床上曾写过一封信請求入党。

跟洪深兄三十年来兄弟般的交往不是几千字所能概括的。他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中热情的文化战士。他靠近党，在党的领导下做过許多出色的工作。他也是在党的文化外交工作中病倒的。党也曾劝他由煩剧的对外工作中回到他的本业。因此洪先生替青艺导演过《四十年的愿望》和《法西斯細菌》，他还計劃再拿起創作的笔。要不是被不治之症夺去了他的生命，洪先生是不会使我們失望的。

有一些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出色的文化人一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暴露出他的資产階級面目，过不了关，而洪深兄所已經达到的觉悟水平却完全保証他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因为他始終一貫地拥护党，尊重和要求党的領導；他一貫拥护社会主义，他在旧社会宁愿死，宁愿举家自杀，而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他执拗地要活下去，至死与病魔奋斗！

我應該細致分析一下洪先生的作品，从他的艺术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精神，吸取它的經驗和灵感。可能有人說：“我們还缺少鑰匙”。但懂得洪先生的为人便是理解洪先生的作品的最好鑰匙。

請允許我就写到这里吧。

田 汉

1957年10月18日夜深

目 录

忆洪深兄 (代序)	田 汉 1
貧民惨剧	1
赵閻王	59
少奶奶的扇子	103
五奎桥《农村三部曲》之一	181
香稻米《农村三部曲》之二	237
青龙潭《农村三部曲》之三	341

附 录

《貧民惨剧》序	445
属于一个时代的戏剧	448
《少奶奶的扇子》序录	455
《少奶奶的扇子》后序	468
《农村三部曲》自序	472
戏剧的人生	474
《洪深选集》自序	489

劇 慘 民 貧

